

区域战略： 外贸结构与产业升级

殷功利◎著

QUYU ZHANLUE:
WAIMAO
JIEGOU
YU
CHANYE
SHENGJ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区域战略： 外贸结构与产业升级

殷功利◎著

QUYU ZHANLUE:
WAIMAO
JIEGOU
YU
CHANYE
SHENGJ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战略:外贸结构与产业升级/殷功利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664-1445-8

I. ①区… II. ①殷… III. ①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研究—安徽 IV. ①F752.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4608 号

区域战略:外贸结构与产业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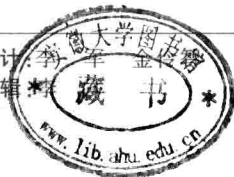
殷功利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0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5664-1445-8

策划编辑: 朱丽琴 姚 宁
责任编辑: 姚 宁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金传霖
美术编辑: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前言

2015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行动计划》中指出:强化开放发展,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支持企业在全中国范围内整合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加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大开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三次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科技进步对各产业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经济总量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全国争先、中部领先,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本书把强化开放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总量扩大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应转化为研究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研究数据和使用计量手段,发现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安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提出合理的建议,推进安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点。①在理论上,国内学术界很少结合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来分析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关实证的文献几乎没有。本书研究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安徽省外贸结构与经济增长、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安徽省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一步拓展经济增长、外贸结构及产

业结构的研究领域。②在实践上,本书通过研究分析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安徽省有关部门调整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首先,进行相关文献综述,梳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理论基础,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分析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总结其结构变化特征和趋势;再次,对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安徽省对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及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点。①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来看,经济分析可以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指的是研讨确立有关“是什么”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就经济而言,是对经济运行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经济现象加以描述和解释,来表明经济现象“是什么”的分析。规范分析是指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出发,说明某一具体经济现象或事物是否符合某种价值规范的分析。规范分析要对经济进行评价,并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找出修正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规范分析需要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而实证分析也离不开规范分析的指导。本书通过实证分析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客观描述,又通过规范分析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理性判断,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②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书利用《安徽统计年鉴》、安徽商务网等统计资料,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安徽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一些内在规律,借助于协整分析、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计量技术对安徽省外贸结构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及外贸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七点。①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及述评。首先,论述研究的背景及其研究的意义。其次,对与安徽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最后,分析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后发优势理论进行重点分析。②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③实证分析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结构。首先,简要介绍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结构关系的典型事实;其次,建立理论模型;最后,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计量分析。④实证分析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首先,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其次,建立理论模型;最后,对安徽省经济增长

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⑤实证分析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首先,对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其次,建立理论模型;最后,对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⑥实证分析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首先,描述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次,建立理论模型;最后,对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⑦对前面几部分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书研究创新点:把工业制成品进一步细分,实证分析安徽省工业制成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合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来分析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

殷功利

2017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1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1
1.2 研究基本内容、突破点	17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18
第二章 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20
2.1 对外贸易理论	20
2.2 产业结构理论	25
2.3 经济增长理论	28
第三章 安徽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现状	32
3.1 安徽省经济增长现状	32
3.2 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现状	36
3.3 安徽省产业结构现状	48
第四章 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54
4.1 安徽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54
4.2 “新常态”下安徽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62
4.3 安徽外贸进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70
4.4 安庆外贸进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75
4.5 安徽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83

4.6	安徽工业制成品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87
第五章	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92
5.1	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产值的视角 ...	93
5.2	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就业的视角 ...	99
第六章	安徽省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104
6.1	安徽省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基于出口商品结构的视角	104
6.2	安徽省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基于进口商品结构的视角	110
6.3	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外贸结构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114
第七章	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20
7.1	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出口商品结构的视角	121
7.2	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进口商品结构的视角	126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131
8.1	结论	131
8.2	政策建议	135
参考文献		142
后记		151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1) 研究现状

① 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

刘志彪(2005)认为我国外向型经济要超越国际代工角色,向产业链高端攀登,以获得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及发展,具体到出口商品的结构上,表现为其变化、升级^[1]。

研究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外学者众多,Helpman(1998)主要从贸易结构的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两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论述^[2]。

在出口贸易结构方面,张燕生(1997)认为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扩大商品出口的规模,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效益,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是贸易部门加速实现转变,使出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发动机”的根本保证^[3]。蓝庆新(2001)基于1989—1997年的数据,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受出口贸易结构影响较大,加快贸易结构转型,促进贸易结构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促进了经济增长。蓝庆新认为,多年来,经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已经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新型外贸调控体系。一方面,我国外贸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等已经上升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单一、封闭的外贸经营格局已经改变,经营主体多元化成为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为外贸发展带来了活力。这些构成了中国未来对外贸易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还存在发展不稳定、结构调整缓慢、缺乏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以出口贸易质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足,其根源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4]。王永齐(2004)基于 Baldwin 和 Mazumdar 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Baldwin 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参与对外贸易,资本积累就会形成,进而促进经济增长。Mazumdar 按照其分析方法却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一个国家只有出口消费产品和进口资本品,资本积累才会形成,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因此,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一国的贸易结构。为了验证 Mazumdar 这一假设,王永齐构造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 VAR 模型确定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5]。Jacint 和 Manuel(2004)认为出口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6]。易力,李世美,刘冰(2006)认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7]。陈仲常,刘林鹏(2006)认为我国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8]。丁雯(2008)通过对我国 1984—2006 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与 GDP 的协整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短期内,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出口或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反作用不明显;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的作用相反^[9]。苏振东,周玮庆(2009)基于关志雄(2002)和 Lall 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出口贸易结构指数,考察了 1992—2006 年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他们又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从出口总量层面上看,出口总量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从出口贸易结构分量层面上看,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即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表明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10]。赵国钦,赵安平(2010)通过 VAR 模型和 VEC 模型,分析了交易费用同经济增长和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初步得出如下结论:由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程度决定的交易费用的上升,刺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和贸易的

增长,从而不断改变着中国的贸易结构并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积累。这个结论不但能够丰富人们对于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原因的认识,而且为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提供了线索^[11]。冯帆(2012)通过 VAR 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贸易结构独立于贸易水平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的效应。HO 变量、产业内贸易指数 IIT 和出口产品集中度 H 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而总产出是影响 SW 指标的长期因素。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内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原因;经济增长并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短期 Granger 因素,说明经济增长长期影响着贸易结构的变动^[12]。王宇新,姚梅(2012)基于安徽省 1988—2008 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初级产品出口和 GDP 的年度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安徽省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安徽省出口商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工业制成品出口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13]。曹标,廖利兵(2014)把服务贸易分为生产者服务贸易和消费者服务贸易,认为二者对各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他们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生产者服务贸易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消费者服务贸易则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有抑制作用,且这一趋势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愈加明显。因此,我国在进行服务贸易的时候应该优先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14]。

在进口贸易结构方面,徐光耀(2007)分析了进口贸易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肯定了进口贸易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并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法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四国作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结果显示:扩大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促进进口的多元化,将更加有利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15]。彭斯达,陈继勇,杨余(2008)运用协整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投入品和消费品贸易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它们都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投入品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而消费品的进口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16]。魏浩,陈灵娟(2008)认为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17]。李兵(2008)对 1980—2005 年我国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初级产品进口则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且我国初级产品进口更多是由工业制成品进口带动的^[18]。裴长洪(2013)研究了一国经济增长在增速与减速的不同背景下,进口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把进口结构划分为 266 个子类,其中货物贸易共 255 个子类,服务贸易共 11 个子类;在 266 个子类划分及运用的基础上,将进口商品分为初级品、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将服务

贸易进口结构划分为传统型服务、信息化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其他服务。裴长洪根据 59 个经济体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而言,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不同类别的产品进口数量与结构的优化以实现经济增长预期。从我国产业条件及进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在优化资本品进口结构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资本品进口比重,相对降低初级品进口比重的增长速度,稳定并着力优化中间品进口结构,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比重;同时灵活配置服务品进口数量和结构,注重增加从外部获得更优质的知识产权类服务及其他服务,从而有利于增加我国新的生产要素供给,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条件^[19]。冯永琦,裴祥宇(2013)基于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角度对中国进口贸易结构变化进行了初步分析,采用 1991—2011 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协整理论、Granger 因果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行业地研究了进口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进口贸易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初级产品进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最终产品进口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更为明显,不同行业产品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较大差异^[20]。曹楠楠(2015)基于 1982—2013 年的数据,通过计量,得出以下结论:我国运输服务出口是 GDP 增长的 Granger 原因,运输服务出口对 GDP 的正向驱动效应显著,且影响时期较长,旅游服务出口是 GDP 增长的 Granger 原因,我国其他服务出口是 GDP 增长的 Granger 原因^[21]。何昌,台德进(2015)对货物贸易进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整个世界初级品和中间品进口增长率波动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资本品和消费品则反之^[22]。余俞红(2015)认为国内外学者就进口贸易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不仅有理论研究,而且有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进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余俞红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将有关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分析江苏省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进口结构的调整对江苏省宏观经济调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23]。吕海霞(2015)构建了以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出口的相对比重衡量的贸易结构指标,通过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回归分析,发现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单向因果关系,贸易结构每提高 1 个单位,实际 GDP 增长率提高 0.01 个单位,而经济增长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因此,我国应加快贸易增长方式转变,逐步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24]。王禹丹(2015)认为随着国际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的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交易技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经

济的重要支撑点,在合理运用本国现有资源的前提下,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结构,以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王禹丹从贸易结构的分析方法入手,主要对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25]。曹楠楠,常亚平(2015)认为 21 世纪以来,全球传统制造业的衰退迹象日趋明显,世界经济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阶段,国际服务贸易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角逐的关键领域,对世界上最大贸易国——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动是如何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的进行了分析^[26]。丁荣荣(2015)认为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丁荣荣运用 EXCEL 和 Eviews6.0 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 ADF 检验与 OLS 回归,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原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中,出口比重大于进口比重,必须进一步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同时不断加强对外贸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力度^[27]。吴肖林(2016)基于国际贸易通过规模经济或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假定,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对外贸易变量,对深圳市 1994—2013 年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扩大出口总量、促进出口产业升级和鼓励自主创新是未来深圳贸易结构优化的总体方向。最后,吴肖林提出了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和支持自主创新型企业并重的政策建议^[28]。尚杨娇(2016)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结合工作经验并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新经济结构模式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经过和国外的对比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是以高能耗、低附加值制造业为基础实现的,在所有的贸易顺差中,高科技产品占比不高。基于此,尚杨娇从两个方面对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研究^[29]。

②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Denison(1976)在对美国 1929—1957 年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后,认为其 12% 的经济增长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30]。吕铁,周叔莲(1999)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看,认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还难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产业结构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之间,更存在于各次产业内部,尤其是工业内部的结构优化水平较低。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推进数量上的工业化,而对工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关注不够,工业化的质量和层次都比较低。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工业结构升级将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31]。刘志彪,安同良(2002)用 Moore 结构变化值指标测算出 1978—1990 年、1990—1999 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度,从而验证了产业结构快速变动这一规律性结论支撑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这一论点,同时揭示了钱纳里“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在中国的适用性,并为产业结构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可信的理论支点^[32]。刘伟,李绍荣(2002)通过采用不同产业结构对生产的影响的生产函数衍生模型,对全国各地(1992—2000年)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提高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33]。刘元春(2003)利用回归和结构计量分析方法对经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详细分析出各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证明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不仅在于渐进式经济制度改革,而且在于转轨的“后发优势”;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无论从增长质量的改善还是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上都高于经济制度变迁;简单的资本非国有化改革在过去有降低我国规模经济以及资本产出效率的作用,未来经济改革的核心应当从过去的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以二元经济转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之上^[34]。刘建平,王克林,黄怀槐(2006)对广东省做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最大的^[35]。李致平,崔立志(2007)基于马鞍山市1990—2005年的数据,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马鞍山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而非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36]。柯军(2008)采用结构层次系数来描述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升级状况,通过生产函数法来测定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明显,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规模,而且影响着要素的生产效率,并且都是正向作用。安徽省产业结构层次按照第二、三、一产业的顺序排列是合理的,按照这一顺序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安徽省应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工业强省的战略^[37]。靖学青(2009)运用数学模型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大;在长三角内部,江苏省和浙江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大,上海市则相对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三角地区及其沪苏浙三省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已进入主要由三级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长三角地区及其沪苏浙三省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与GDP年均增长率的关系也较密切^[38]。卢福财,李志波(2011)运用动态计量经济方法的VAR模型,对江西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江西产业结构变动与实际经济增长统计上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服务业的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且复杂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这表明产业

结构调整是推动江西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39]。朱清贞,甘敬义(2013)通过投入产出分析,认为近年来江西省产业结构稳定表现为“二、三、一”结构,各产业间的关联性和专业化程度偏低。然后,他们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对江西省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短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大于第二产业,江西省产业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三次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40]。王希(2013)以皖江城市带 1998—2011 年的数据为例,分析城市带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第一、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比与人均生产总值的关系,得出城市带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受三个产业占比变动影响的方向及程度不相同的结论^[41]。张辉(2014)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历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拉动,但 2009 年以后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始超越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42]。

李兵(2015)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视角,利用河南省 1982—2011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必要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三次产业结构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显著;在三次产业结构与河南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推动经济增长。李兵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为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相应建议^[43]。吴磊(2015)认为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传统优势明显,但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二、三产业支撑。吴磊借助偏离份额分析模型,衡量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劣及其竞争力,并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进一步提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建议^[44]。石丹,王涛(2015)通过构建一个基础模型并结合地区资源特征进行拓展,对衡量产业结构整体与局部失衡程度的指标进行重新表述,并用该指标估计海南省产业结构整体与局部失衡情况,检验产业结构失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整体与局部的失衡皆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根据失衡的具体特征及其影响,他们对海南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提出建议^[45]。郑耀群,杨欢欢,胡新(2015)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法,对陕西省 1990—2013 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回归分析法测算了陕西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陕西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陕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根据陕西的产业基础和优势,陕西省应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继续保持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地位^[46]。王慧娟(2015)认为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

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基础之上的。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重点问题,尤其是我国在产业结构化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达到合理化水平的情况下,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突破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为此,王慧娟主要从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47]。张敏,李晋(2015)以劳动生产率为因变量,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模式的方法,对山西省产业结构效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山西省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从而揭示了山西省产业结构效益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缺陷,为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提出建议^[48]。孙泰岩,韩美兰(2015)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以及具有参考意义的民族地区,基于产业视角探究其经济增长方式,着重分析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出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以供其他民族地区借鉴^[49]。檀雅丽(2015)为研究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了阜阳市2006—2013年的经济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对阜阳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第一产业影响次之,第二产业影响最小,但产业与产业间、产业内部之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50]。

张文军(2015)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而且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发展过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在考察某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纳入考量范围。李东方(2015)认为伴随改革开放,产业结构特有的演变进程,凸显了合理化的总倾向,产业结构调整能促动宏观态势下的经济增长。在总体贡献的比值中,要素重置表征效率的地位日益突显。产业结构变迁对各区段的经济增长、对应着的波动态势,都具有独特影响。为此,李东方辨析了细化的影响,探究合理情形下的产业新结构^[52]。唐梓又,董婉婧,张滨,刘延龙,罗永,耿玉德(2015)以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为例,利用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模型求解得到1983—1992年、1993—2002年和2003—2012年三个阶段三次产业发展对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系数,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发展型产业结构指数,并利用实证数据间接证明了该指标与PLS回归模型的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根据发展型产业结构指数得到三个阶段三次产业的最优产业结构;黑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分别经历了基础期、发展期和平衡期,产业结构将进一步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53]。廉同辉(2015)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分析2002—2011年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廉同辉通过研究发现:皖江城市带各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经

济增长贡献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005年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占经济增长的份额均呈现缩小趋势;产业结构变动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M值与GDP增速、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增速具有一定关系,Z值、M值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相关关系显著^[54]。赵雪梅(2015)认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会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演进。她以我国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对2001—2013年我国三大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产业结构仍在不断地优化升级,并运用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根据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55]。王微(2015)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紧密,产业结构变动既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变动反映了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其对三亚市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对理解三亚经济的增长问题以及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现实意义^[56]。李春生,张连城(2015)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基于1978—2013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起了主要的作用;从短期来看,第三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比较突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缓慢但是效果较为持久。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将对产业结构的变迁起主要作用,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57]。简诗雅(2015)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及发展水平,制约着经济发展速度和持续性。她以1990—2013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安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第二产业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第一、三产业次之的结论,提出安徽省应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着力构建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等建议^[58]。刘伟,蔡志洲(2015)认为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不同阶段的各个产业增长率的差别以及供求关系的变化,产业结构将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升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如此,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转轨进程,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特殊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后期。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将代替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具体表现为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将高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开始迅速提升,并由此带动就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趋势,也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应调整和改善宏观调控和管理^[59]。刘森(2015)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分